



作為詩人與翻譯家的穆旦

另眼看作家系列之十三

蔡登山◎ 文字工作者

穆旦本名查良錚，著名詩人和詩歌翻譯家。1918年出生於天津，祖籍浙江海寧。海寧查家是江南世家，幾百年中名人輩出，領盡風騷，康熙皇帝稱之為「唐宋以來巨族，江南有數人家」。周汝昌在文章中說，查家分南北兩支，「北查」世居天津水西村，大約就是穆旦出身的那一支了。武俠小說的一代宗師金庸本名查良鏞，亦是浙江海寧人。穆旦其實是金大俠本家的大表哥。1934年查良錚將「查」字一拆為「木」、「旦」，「木」、「穆」諧音，於是開始用「穆旦」作筆名。這正如查良鏞後來把「鏞」字一分為二，成為「金庸」。

穆旦在11歲那年進入天津南開中學讀書，開始詩文創作，現共存1934至1935年載《南開高中生》的詩8首。這些「少作」刻劃了流浪人、老木匠、繅絲工等勞苦大眾，經受的「把人變成了爛泥」的煎熬，鞭撻了「另一個世界」窮奢極欲的生活。他已經開始理性地思考人生和現實、憂鬱地關注社會和底層的人民。

當時日寇侵凌，平、津首當其衝，年青的詩人熱心抗日救亡活動，又寫下了〈哀國難〉，「灑著一腔熱血」大聲疾呼：

眼看祖先們的血汗化成了輕煙，
鐵鳥擊碎了故去英雄們的笑臉！
眼看四十年的光輝一旦塌沉，
鐵蹄更翻起了敵人的兇焰！

一個十六、七歲的中學生已經投身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的洪流，開始唱起「追求進步」的序曲。

1935年7月，穆旦以優異成績同時被3所大學錄取。最後，他選擇清華大學外文系。穆旦在這裡繼續探索和寫作現代詩歌，並在《清華學刊》上發表，他寫雪萊式的浪漫派的詩，有著強烈的抒情氣質，又有很強的現實感。兩年後，抗日戰爭爆發，穆旦隨校遷往昆明，清華與北大、南開合併，組成西南聯合大學。在這片被稱為「振興並發展中國新詩的新墾地上」，穆旦得到著名的學者、詩人聞一多、燕卜蘇（William Empson）等人的言傳身教，尤其是燕卜蘇當時開了「當代英詩」課，從19世紀詩人霍普金斯（G.M. Hopkins）一直講到20世紀詩人奧登（W.H.

Auden)，使他深受西方現代派詩歌的影響，逐漸形成自己獨樹一幟的全面現代化的詩風。

1940年穆旦畢業於西南聯大外文系，他留校任教，負責敘永分校新生的接收及教學工作。1942年寫的〈詩八章〉，次年即和另3首收入聞一多選編的《現代詩鈔》。1942年，他卻作出一個令人意外的決定：投筆從戎。他參加中國遠征軍，入緬抗日，親歷震驚中外的野人山戰役。據好友王佐良發表於英國倫敦 *Life and Letters*（1946年6月號）的〈一個中國詩人〉一文，說：「但是最痛苦的經驗只屬於一個人，那是1942年的緬甸撤退，他從事自殺性的殿後戰。日本人窮追，他的馬倒了地，傳令兵死了，不知多少天，他給死去的戰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趕著，在熱帶的毒雨裏，他的腿腫了。疲倦得從來沒想到過人能夠這樣疲倦，放逐在時間——幾乎還在空間——之外，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陰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，更不能支持了，帶著一種致命的痢疾，讓螞蝗和大的可怕的蚊子咬著。而在這一切之上，是叫人發瘋的饑餓。他曾經一次斷糧到8日之久。但是這個24歲的年青人，在5個月的失蹤之後，結果是拖了他的身體到達印度。雖然他從此變了一個人，以後在印度3個月的休養裏又幾乎因為饑餓之後的過飽而死去，這個瘦長的，外表脆弱的詩人卻有意想不到的堅韌，他活了下來，來說他的故事。但是不！他並沒有說。因為如果我的敘述洩露了一種虛假的英雄主義的壞趣味，他本人對於這一切淡漠而又隨便，或者便連這樣也覺得不好意思。只有一次，被朋友們逼得沒有辦法了，他才說了一點，而就是那次，他也只說道他對於大地的懼怕，原始的雨，森林裏奇異的，看了使人害怕的草木怒長，而在繁茂的綠葉之間卻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爛的屍身，也許就是他的朋友們的。」

過了3年，詩人才根據這段不堪回首的經歷，寫下了〈森林之魅—祭胡康河上的白骨〉。這首長詩是以〈葬歌〉終結的：

在陰暗的樹下，在急流的水邊，
逝去的六月和七月，在無人的山間，
你的身體還掙扎著想要回返，
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。
那刻骨的飢餓，那山洪的沖擊，
那毒蟲的嚙咬和痛楚的夜晚，
你們受不了要向人講述，
如今卻是欣欣的林木把一切遺忘。
過去的是你們對死的抗爭，
你們死去爲了要活的人們的生存，
那白熱的紛爭還沒有停止，
你們卻在森林的週期內，不再聽聞。



靜靜的，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，
 還下著密雨，還吹著細風，
 沒有人知道歷史在這裏走過，
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。

這首椎心泣血的長詩，它不僅是對胡康河上的白骨深情的祭奠，也是紀念千千萬萬為抗日而犧牲的將士的史詩。

四〇年代，是一個風雲變幻、風雷激盪的年代。在這個年代，他抒寫出深沉雄渾的生命之歌。學者龍泉明、汪雲霞認為，他的詩歌，透視了敏感良知的知識分子在苦難歲月裡豐富複雜的精神境遇，呈現出詩人對人類生存狀況、民族前途運形上思考的痛苦凝重的情感色彩。生的希望與絕望，愛的欣喜與悵惘，民族的期待與災難等在他的詩中交織、扭結、矛盾和衝突。透過其詩，可以感受到詩人躁動、苦悶、壓抑和焦灼的痛苦靈魂。詩人唐湜在〈穆旦論〉文中，就說：「（他的詩）給人一種難得的豐富和豐富到痛苦的印象，甚至還有一些掙扎的痛苦印記，他有一份不平衡的心，一份思想者的堅韌的風格，在別人懦弱得不敢正視的地方，他卻有足夠的勇敢去突破。」

香港學者李焯雄認為，整體而言，穆旦詩的基本風格是悲觀和冷靜的。他明白就是不能把現實轉化為理想，他也不能逃避；語言世界、愛情等均不能提供逃避之所，因此他詩中始終沒有冷漠的態度，漠視客觀的世界。穆旦認為「我是太愛，太愛那些面孔了，/他們諂媚我，耳語我，諷笑我，/鬼臉，陰謀，和紙糊的假人，/使我的一拳落空」他畢竟是悲憫的，不流於冷嘲。

1949年8月穆旦赴美留學，入芝加哥大學攻讀英美文學、俄羅斯文學。同年12月23日，與早在一年多前就到芝加哥大學攻讀生物的周與良結婚。1952年底，在芝加哥大學研究院畢業後，穆旦又懷著一以貫之的愛國情操，一廂情願地偕夫人周與良博士兼程回國。次年5月，他們倆同時應聘到天津南開大學任教，滿以為從此可以安心報效祖國了。穆旦秉性耿直，遇事往往仗義執言，在那「黃鐘毀棄，瓦釜雷鳴」的年頭，自然不能見容於那些為虎作倀的宵小。僅僅一年多之後，就發生所謂的「外文系事件」，沒有料到這竟成了穆旦後來被定為「歷史反革命」的依據之一。

1955年，「肅反運動」中，穆旦成為「肅反對象」，受到批鬥審查，參加「遠征軍」的「問題」也被提了出來。1957年春「整風運動」開始，穆旦接受回國後幾年來「禍從口出」的教訓，在「大鳴大放」中守口如瓶，總算逃過了言禍，在「反右運動」中倖免於一頂「右派」的棘冠。天真的詩人哪懂得，「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」！1957年2月，他發表長詩〈葬歌〉，真誠地抒寫「我們知識分子決心改造思想與舊我決裂」，卻受到「個人主義」的譏評。5月7

日，在《人民日報》發表諷刺詩〈九十九家爭鳴記〉，這首詩後來被批判為「毒草」、「向黨進攻」，也被作為定罪的依據之一。「反右」中受到批判，被迫寫了檢討。這些只不過是他的厄運的序曲。1958年底，一頂「歷史反革命」的帽子憑空扣在了一位萬里來歸的愛國詩人的頭上，「機關管制三年」，而他的「反革命罪證」正是當年愛國從軍，參加抗戰！從此開始了20年的賤民生涯，株連全家，「文革」期間又受盡折磨，書籍、手稿、一些家庭用品，被褥、衣服等都當「四舊」被拉走，親友迴避，詩神無蹤。

夫人周與良回憶道：「『四人幫』打倒後，他高興地對我說『希望不久又能寫詩了』，還說『相信手中這隻筆，還會重新恢復青春。』我意識到他又要開始寫詩，就說『咱們過些平安的日子吧，你不要再寫了』。他無可奈何地點點頭。我後來愧恨當時不理解他，阻止他寫詩，使他的夙願不能成為現實，最後留下的二十多首絕筆，都是背著我寫下的。他去世後，在整理他的遺物時，孩子們找到一張小紙條，上面寫著密密麻麻的小字，一些是已發表的詩的題目，另外一些可能也是詩的題目，沒有找到詩，也許沒有寫，也許寫了又撕了，永遠也找不到了。」

1977年春節前，穆旦因腿傷在天津重新入院手術。不料，還沒來得及動腿部手術，2月25日下午心臟病突發，26日凌晨病逝。穆旦在1976年3月31日給孫志鳴的信中寫道「我在周總理逝世後10天，摔了一跤，跌下自行車，右腿股骨頸折斷（又叉進一些），至今已70天了，還沒有全好，每日躺在屋中用拐走路……」在1976年6月15日的信中再次寫道：「我的腿真該詛咒，再過4天就5個月，可是還未全好，還得用一拐支著，現在每天練習多走，以期快好。看樣子也許得6個月？」然而6個月，又6個月過去了，詩人的腿傷還是沒有好。穆旦在1976年10月30日、11月7日和1977年1月12日給郭保衛的信中寫道：「現在我的骨折生長不佳，又裂開一縫，必須開刀，釘釘子，還要重新養起。不過馬上動不了手術，因為醫院無床位……」；「我每日在校內近處走動，用著雙拐。現在是等待醫院對普通病人開放床位。目前由於有震情，所以不開。心情並不很好。」；「我現在等過春節，過了節，就打算進醫院，狠一下心作手術，那麼我們有兩個月就不便寫信了，主要是我臥在床上大概寫不了……」。看來醫院終於對穆旦開放了床位，在1977年2月26日穆旦上手術檯的時候，心情是等待多時的輕鬆吧。他大約覺得再過幾個月又可以健步如飛，可以繼續寫他的詩歌，繼續完善他對普希金的譯筆。身為詩人，常有額外的苦難，但是也有格外悠長的青春，虛齡60歲的穆旦，還有多少的詩情沒有釋放，多少計畫等待完成啊。然而詩人是帶著開敞的傷口死去了。這是多年來身心備受摧殘的必然後果。

在無法寫詩及發表詩作的日子，穆旦以梁真或查良錚的署名開始他的譯詩工作，王佐良說：「他早已精通英文，後來又掌握了俄文，回國之初就譯了大量普希金的詩，包括《歐根·奧涅金》。後來他轉向英國浪漫主義詩，艾略特的《荒原》就是他重譯而且仔細加註的。他



的最主要的成績則是拜倫長詩《唐璜》的全譯本，全書17章14節都以略加變通的義大利八行體（*ottava rima*）為格律譯出，保持了拜倫的口語體以及諷刺藝術的幾乎一切特點，讀起來像原著一樣流暢生動。」

夫人周與良說：「良錚譯詩，是全身心投入，是用全部心血重新創作，經常為一行詩，甚至一個字，深夜不能入睡。他常說，拜倫和普希金的詩，如果沒有註釋，讀者不容易看明白。他的每本譯詩都有完整的註釋。偶爾他也對我說，『這句詩的註釋就是找不到。』為了一個註釋，他要跑天津、北京各大學圖書館，北京圖書館等。他跌傷腿以後，還拄著拐杖去南大圖書館找註釋。尤其《唐璜》的註釋，他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，查閱了大量文獻，雖然出版時未被採用，至今我還保留著厚厚一本註釋。去醫院進行手術前，他曾對我說：『我已經把我喜愛的拜倫和普希金的詩都譯完，也都整理好了。』他還對最小的女兒小平說：『你最小，希望你好好保存這個小手提箱的譯稿，也可能等你老了，這些稿件才有出版的希望。』他最關心的是他的譯詩，詩就是他的生命，他去世前沒給家人留下遺言，這些就是他的遺言。」

1980年7月，《唐璜》終於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，立即成為公認的文學翻譯的經典巨著。1981年，南京譯林出版社重新出版穆旦過世前精心修訂過的《普希金抒情詩集》兩大卷（1954年上海初版）。1986年，一本《穆旦詩選》，幾經周折，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，只選59首。直到1996在詩人逝世20週年前夕，一部《穆旦詩全集》終於由中國文學出版社在北京發行了。這部詩集收錄詩人從中學時代的「少作」到卒然逝世前的殘稿，共一百五十餘首。正如編者所說：「正是這樣一部由『抹去詩與生命之界』的『殉道者』，用超絕的詩藝與堅韌的生命熔鑄成的《詩全集》，在現代詩史上留下了一座卓異的里程碑。」

學者巫寧坤說：「《穆旦詩全集》中最動人的是1976年寫的27首詩。澎湃的詩情在被迫禁若寒蟬20年之後，竟又在短促的最後一年中再現輝煌，宛如漫天陰霾之後的晚霞夕照，令人為之目眩，幾乎是一個奇跡。穆旦的晚年是十分寂寞的，正如汪曾祺早在1947年讀過《穆旦詩集》後就慨乎言之的：『詩人是寂寞的，千古如斯！』半生的追求、無盡的苦難、深沉的幻滅，都昇華為爐火純青的對生命的詠嘆。」

〈智慧之歌〉哀嘆「我已走到了幻想底盡頭」，愛情消逝，友誼被「生活的冷風鑄為實際」，「迷人的理想終於成笑談」，剩下的只有日常生活的痛苦，詩人只能直面慘淡的人生：

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樹不凋，
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為營養，
它的碧綠是對我無情的嘲弄，
我咒詛它每一片葉的滋長。

〈沉沒〉絕望地驚呼「身體一天天墜入物質的深淵」：

愛憎、情誼、職位、蛛網的勞作，
 都曾使我堅強地生活於其中，
 而這一切只搭造了死亡之宮。

《穆旦詩全集》的壓卷之作是那年 12 月寫的〈冬〉，4 章 64 行，唱出了「人生本來是一個嚴酷的冬天」的哀歌，淒婉欲絕：

我愛在淡淡的太陽短命的日子，
 臨窗把喜愛的工作靜靜做完；
 才到下午四點，便又冷又昏黃
 我將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。
 多麼快，人生已到嚴酷的冬天。
 ……

我愛在雪花飄飛的不眠之夜，
 把已死去或尚存的親人珍念，
 當茫茫白雪鋪下遺忘的世界，
 我願意感情的熱流溢於心間，
 來溫暖人生的這嚴酷的冬天。

儘管最後詩人的心中有一股暖流緩緩的出現，在不由得升起希望時，希望卻又落空了。詩人這時竟因心臟病突發，而死在手術檯上。它宛如不幸的天才詩人為自己作的墓誌銘。

2005 年末，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 8 卷本的《穆旦譯文集》。2006 年 4 月，兩卷本的《穆旦詩文集》也已面世，這是到目前為止收錄穆旦譯文和詩文最為完備的專集，首次系統整理出版，幾乎囊括了穆旦的全部作品。